

■学人素描

张承耀：用两只眼睛仔细看企业



张承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管理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是国内经济学界研究企业理论影响广泛的专家之一。

在过去30年中，他在股份制、国内公司治理和公司成长环境等研究领域都有专著和建树。他不仅提出了用“两只眼睛看企业”的独特理论，而且最近还提出了让消费者为企业“免费打工”的新观点。此外，他在研究和引入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模式及向国人（晋商）学习管理等方面都有贡献。

◎倪小林

在多年前一次有关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并认识了张承耀教授。当时，恰逢证券市场建立八年之际，经济界的活跃人物们都把证券市场走过八年历程当作改革开放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情。张承耀教授作为演讲人之一，针对证券市场公司治理问题，他的发言坦率尖锐，当场获得了与会者的掌声，除了他的观点独特，直言快语和幽默的表达方式，演讲时还不断引用典故，或许也是他获得更多掌声的关键。

之后，我曾多次采访过张承耀教授，也曾跟踪过他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他长期在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企业创新永无止境

在过去30年中，他对于股份制、国内公司治理、公司成长环境等课题的研究都有过专著和建树。

张承耀对企业的热衷，与他过去的生活有很密切的关系。1947年5月出生于河北省秦皇岛市，1964年入清华大学上学。后来，他还有过在本溪钢铁厂做技术员的经历。1982年至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就读，师从蒋一苇先生，为我国第一批企业管理专业毕业研究生两名中的一名；毕业后留工经所工作至今。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企业经营管理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管理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1990年到日本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一年。

如今张承耀虽已近退休，但对企业研究依然很上心。

中国企业与现代新技术融合正在创造新型的消费形式，消费行为的变化，反过来又将成为企业创新的动力。这是西方新近诞生的消费者参与理论。他在《企业管理》杂志2008年第一期的文章中提出：企业管理创新有许多方向可供选择，其中之一就是让消费者为企业“免费打工”。

■美加观潮

轻松理财：加拿大人偏爱专家理财

◎何祖

很奇怪，偌大的一个多伦多市竟然见不到一家证券公司营业部。可是，我在上海所住的小区附近，前后左右有不下于四家证券公司的营业部。于是，我开始琢磨这个问题了。

在加拿大，多伦多证交所座落在国王街上，面积也不过三百平方米。除了电脑大屏幕外，就是一家财经台在里面搞了个演播台。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但多伦多500指数却是北美仅次于道琼斯的第二大股票指数。

那么，人们怎么投资股票，或者说怎么做股票交易呢？

可以说，大部分人投资股票，特别是一些专业人士如医生和工程师等，他们都是委托理财专家来打理自己的投资理财业务的。

为什么他们要委托理财专家自己去买卖股票呢？一则做不好，再则可能会影响工作。所以，尽管加拿大人投资股票，不会像我们的上班族

面内容。在2006年，他发表了《两只眼睛看企业》一书，认为我们应该从两个角度观察企业：左眼睛看企业的资产结构，右眼睛看企业的资本结构；企业是生产经营组织与所有分配组织的二重符合；是管理者管理与管理者的二重符合。

张承耀研究企业的知名度很大，经常是在正统的研究之余，研究一些很大众化的课题。例如，2001年第12期《企业管理》杂志发表了他对山西晋商的评论文章。他认为，西方企业倡导出资者与经营者实现分离，但山西晋商早在500多年前就实现了两权分离，那就是“财东”与“掌柜”的分离。他认为，晋商500年的兴衰史可以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教科书。

在他眼里，东西方管理文化在某一历史时点上有惊人相似之处。在西方管理学上，出资者将企业交给经营者来经营，会遇到经营者的选拔、激励和监督等问题。特别是所有者选择经营者之前难以知道他们的能力、德行与积极性等都，这就是所谓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晋商“财东”挑选“掌柜”是严格任人唯贤的，既重视其祖上的诚信史，又要将其放到基层，层层考察和提拔。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至今，经营者的产生并没有确定的程序，这是很不正常的。

另外，晋商在激励经营者、监督约束经营者等方面也都做得有板有眼。晋商对经营者的个人信用要求十分严格，有严格的个人信誉档案，自己有劣迹还将影响到下几代，这些对个人行为有相当的限制。这一点正是我们面临的公司信用问题的难点。

当然，晋商的衰败也是一个事实，这一点更是张承耀研究时所关注的。尽管晋商建立了“出资者与经营者相分离”的制度，但导致晋商后来衰亡的一个原因就是“财东”不务正业，放弃管理，即“出资者缺位”了，这是一个教训。还有，无限责任制也不是规范的股份制度，最后导致经营风险全部由“财东”来承担，并导致其家破人亡。另外，晋商在出现经营危机时，没能及时进行体制创新是其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

有一点值得注意，晋商之所以能得以发展，还得益于政府的放手。这些企业基本上不是国有的，政府也很少有不当干预。但到了后期，企业对政府的依赖程度加大，最后就增加了企业的风险。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政企不分”的负面影响。

当我们发展经济的时候“眼睛向外”，是不是也要“眼睛向内”，向我们的前人学习呢？张承耀运用自己对中国企业多年研究的经验，对应晋商发展衰亡的史实，提出了发掘中国商业历史中的价值部分，也不失为企业改革的模板。

研究推广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模式

可以说，我国中投公司的成立是我们学习新加坡淡马锡模式的一种方式，而新加坡淡马锡公司一直以来也是我国学界和媒体不断研究和关注的一大亮点。

向国人学习企业管理

向国人学习企业管理，张承耀的企业研究视野也从现代延伸到了山西晋商的历史范例研究上。

他在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方面的成果是相当丰硕的。尤其是他在《现代企业制度原理》(1994)一书中提出了“两只眼睛看企业”的这一概念。随后，在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的1999年国家社科重点课题“企业管理现代化、科学化问题研究”中，他又详细列出了“两只眼睛看企业”涉及的各方

面内容。在2006年，他发表了《两只眼睛看企业》一书，认为我们应该从两个角度观察企业：左眼睛看企业的资产结构，右眼睛看企业的资本结构；企业是生产经营组织与所有分配组织的二重符合；是管理者管理与管理者的二重符合。

张承耀研究企业的知名度很大，经常是在正统的研究之余，研究一些很大众化的课题。例如，2001年第12期《企业管理》杂志发表了他对山西晋商的评论文章。他认为，西方企业倡导出资者与经营者实现分离，但山西晋商早在500多年前就实现了两权分离，那就是“财东”与“掌柜”的分离。他认为，晋商500年的兴衰史可以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教科书。

在他眼里，东西方管理文化在某一历史时点上有惊人相似之处。在西方管理学上，出资者将企业交给经营者来经营，会遇到经营者的选拔、激励和监督等问题。特别是所有者选择经营者之前难以知道他们的能力、德行与积极性等都，这就是所谓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晋商“财东”挑选“掌柜”是严格任人唯贤的，既重视其祖上的诚信史，又要将其放到基层，层层考察和提拔。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至今，经营者的产生并没有确定的程序，这是很不正常的。

另外，晋商在激励经营者、监督约束经营者等方面也都做得有板有眼。晋商对经营者的个人信用要求十分严格，有严格的个人信誉档案，自己有劣迹还将影响到下几代，这些对个人行为有相当的限制。这一点正是我们面临的公司信用问题的难点。

当然，晋商的衰败也是一个事实，这一点更是张承耀研究时所关注的。尽管晋商建立了“出资者与经营者相分离”的制度，但导致晋商后来衰亡的一个原因就是“财东”不务正业，放弃管理，即“出资者缺位”了，这是一个教训。还有，无限责任制也不是规范的股份制度，最后导致经营风险全部由“财东”来承担，并导致其家破人亡。另外，晋商在出现经营危机时，没能及时进行体制创新是其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

有一点值得注意，晋商之所以能得以发展，还得益于政府的放手。这些企业基本上不是国有的，政府也很少有不当干预。但到了后期，企业对政府的依赖程度加大，最后就增加了企业的风险。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政企不分”的负面影响。

当我们发展经济的时候“眼睛向外”，是不是也要“眼睛向内”，向我们的前人学习呢？张承耀运用自己对中国企业多年研究的经验，对应晋商发展衰亡的史实，提出了发掘中国商业历史中的价值部分，也不失为企业改革的模板。

研究推广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模式

可以说，我国中投公司的成立是我们学习新加坡淡马锡模式的一种方式，而新加坡淡马锡公司一直以来也是我国学界和媒体不断研究和关注的一大亮点。

不过，淡马锡公司被介绍到中国，是与张承耀在几年前的研究分不开的。早在2000年，我国相关部门已意识到新加坡淡马锡公司的经验值得借鉴，并组织淡马锡公司到北京进行宣讲。宣讲后，还安排了两位学者进行评论，其中一位就是张承耀教授，另一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院的一名专家。

张承耀回忆道，“当时我谈了12点评论，后来我将他们的资料进行整理成文章，先后在一些报刊上发表并转载。可是，当时并没有引起注意。到了2006年之后，才逐步引起注意。”

张承耀认为，淡马锡公司的经验有三个重要方面值得借鉴：一是淡马锡公司与财政部的关系（如利润上缴关系等）；二是淡马锡公司本身的政治结构（国有人员与民营企业人员基本对半，组织部门设置等）；三是淡马锡公司与下属企业的关系，特别是对下属企业的管理原则。我们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比人家还差得多。

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新加坡采取了“两步走”的办法。第一步是“企业化”，第二步是“民营化”，即吸收社会资金使企业投资者多元化，政府逐

步减少在许多企业中的股份；企业改制的主要目的不是筹资，而是通过入市接受公众监督。

同样，一些重要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关注，如政企分开是政企分开的前提，政府没有另外派出特派稽查员而是让国有企业按照公司法进行自律并接受社会监督、淡马锡控股公司每年也要将红利的一半上交给政府及董事会的人员结构值得学习等。而淡马锡公司与关联企业的任何交往都要保持“一臂距离”，即按照商业准则来评审，评估投资回报是否合算。这一点更值得关注。

张承耀认为，新加坡约有300多万人，有140万的大众拥有了新加坡电信公司的股票，这是最为接近“全民所有制”的典型。我们一直特别强调“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那么，能不能做到老百姓的资产也一起“保值增值”？中国现在利息率一再降低，还收了利息税，但是在疏通大众直接投资渠道方面还应更下功夫。

张承耀之所以对淡马锡的研究如此上心，这与他多年来研究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是不无关系的。

■本期人物话语



顺差过大对中国无益

陈德铭（国家商务部长）3月12日在北京接受中外记者集体采访时指出，在人民币的升值过程中，一些国外的声音希望加快升值，减少贸易上的不平衡。但中国不是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过大的贸易顺差对中国没有好处。虽然今年2月我国的出口增幅明显下降，但预计今年中国出口还将继续平稳增长。

■多声道

外资在中国有巨大发展空间

王志乐（商务部贸研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3月14日对新华社记者表示，虽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加大，但仍有一定的优势。随着中国产业升级步伐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加快，外资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下一步中国将加大自主创新、加快产业升级和协调地区发展，对国外资金和新技术的需求更大，外资并购机会也大大增加。这些因素都会促进外商继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

呼吁加强对抵押贷款放贷机构监管

亨利·保尔森（美国财政部长）3月13日在华盛顿发表讲话说，有必要加强对抵押贷款放贷机构的监管，以避免目前这样的信贷危机再次发生。其中，美国“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建议联邦和州监管机构加强对抵押贷款放贷机构的监管，敦促州财政监管机构对抵押经纪人实行强有力全国性的许可证标准。同时，这个小组还建议改进信用评级机构的工作，采取措施以使风险公开和风险评估工作做得更好，并提出一系列旨在改善美国和全球金融市场环境的建议，其中包括降低系统性风险、恢复投资者信心以及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应采取的步骤。下一步是要推动这些建议付诸实施。对此，总统工作小组将继续对形势进行评估，并考虑是否采取进一步行动。

中国将合理利用好国内外两种矿产资源

汪民（国土资源部副部长）3月14日在就“国土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接受中外记者集体采访时表示，关于中国的矿产资源供应，首先是立足国内，然后积极开拓国外。“走出去”是我们的必然选择。由于矿产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完全依靠自身的资源满足发展，“走出去”成为必然选择。中国将在互利共赢原则的基础上，开展多层次、多领域、多途径的矿业合作，合理地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中国矿产资源供应将坚持四个基本方针：一是坚持开源与节流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二是坚持国内外两种资源并举，首先立足国内，然后积极开拓国外；三是坚持市场调节和政府引导相结合。在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四是开发与保护并重，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招标化整为零的腐败新手段值得关注

杜黎明（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监察局副局长）日前在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提出，基建工程项目化整为零招标突出、工程的部分或大部分分项工程未纳入整体招标等将招标化整为零的腐败新手段值得关注。审计发现，基层一些单位不熟悉招投标规定而出现遗漏外，更多是一些单位和人员的主观故意。另外在建设项目竣工决算审计中发现，一种新的腐败手段——基建工程项目化整为零招标的问题较为突出。主管部门应加强检查监督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既查处单位，更注重对直接责任人的查处，同时强化工程资金的监管。

■学人新观察

消费转型下的国家战略选择

◎杨涛

长期以来，在投资、消费和净出口这“三驾马车”中，一直是由高投资、高出口来唱主角，而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则增长乏力，成为中国经济的“软肋”。自2001年经济开始复苏，但“高增长、低通胀”的光环，完全掩盖了最终消费率不足等经济弊端。但是，目前我国的消费却出现了一些积极现象，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并引导其转化为经济增长中的有利因素。

首先，最引人注目的是，据估算，在2007年11.4%的GDP增长中，消费贡献了4.4个百分点，高于投资贡献的4.3个百分点，以及出口贡献的2.7个百分点。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再次居于首位，表明近年来抑制投资过热、扩大国内消费的措施开始产生效果。

其次，2007年可能是新一轮消费增长周期的开始。自1993年到1995年，投资对GDP贡献率连续超过消费，而1996年到2000年，消费贡献率又回归首位，这可理解为第二轮消费增长周期，主要动力是政府刺激内需的各项扩张性政策的作用。现在，2008年消费增长潜力仍然强劲，如果确实能启动第三轮消费增长周期，将有利于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

再者，对于当前消费增长的动力，除了传统的政策支持、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等因素之外，还出现一些新内容，主要是人口结构变化、金融深化加速与奥运经济。

最后，从通货膨胀与消费需求的关系来看，目前也出现新特征。本轮通胀压力的根源除了需求拉动因素，更主要的还是成本推动的影响。在此情况下，政府调控不会出现“一刀切”的需求紧缩政策，而且在投资、出口增长放缓的情况下，还需要刺激消费来防止潜在的“滞涨”风险。因此，未来消费增长受到宏观调控冲击的可能性相对要小。

当然，虽然当前消费出现了好的方面，但仍存在某些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

首先，从存量角度看，最终消费率在不断降低，始终是影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最终消费率最高在1981年达67.1%，但2006年下降到49.9%。消费不足表明经济发展成果并未充分转化为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也背离了改革的初衷。

其次，1978年以来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并且在最终消费构成中从1978年78.6%下降到2006年的72.6%。而政府消费率却增长迅速，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私人消费，使社会消费率总体逐年下降，这与政府财政收入增速过快有关，不利于扩大消费、改善消费结构。

再者，城乡之间消费能力、消费水平和消费规模的差距越来越大。从城乡消费水平对比这一指标来看，1978年到1990年之间在2.9以下，而此后逐渐呈现扩大趋势，2006年达3.6，表明城乡差距不断拉大。从区域角度来看这一问题，落后地区面临更严重的城乡消费分化问题。

最后，居民消费增长出现两大新的制约因素。一方面，对社会保障的程度有所忽视，导致近年来社保支出严重不足，客观上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另一方面，住房市场化改革也出现了扭曲现象，使居民当前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大幅下降。如果不从根本上扭转这两个因素，将来消费增长必然缺乏后劲。

由此看来，目前我国消费正处于重要转型期，对此应采取有效的战略措施，以保证其良性转型，并对经济社会产生正面影响。

第一，抓住契机，实现从“出口导向”到“立足内需”的国家战略转变。近年来，人们开始反思以压低资源和劳动力价格而扩大出口的弊端，把发展重点转向国内的思路也逐渐被各界所接受。应该说，“立足内需”是着眼于消费而非投资，有助于真正落实这一战略转变。

第二，以促进消费来解决经济效率问题，包括经济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内部失衡主要是储蓄消费比例的失调，这也是流动性过剩、投资过剩等矛盾的根源。外部失衡主要是国际收支失衡，在全球经济过度依赖美国消费者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金融结构扭曲，我国的外部失衡只是这种现象的体现之一。只有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增加消费，才有助于改变这一状况。

第三，以完善消费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包括收入两极分化、城乡差异等。对此，只有真正能够增加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消费才会获得更强劲的增长动力。另外，应该致力于尽快解决城乡消费水平差距，对此除了推进城市化进程之外，更要为农民增加实际消费能力。

第四，应努力激活居民购买力，变短期动力为长期动力。当然，在通胀压力环境下，通过抑制物价上涨和采取补偿性措施，政府政策应尽量减少这部分消费，而促进居民主动消费和实际消费能力的提高。事实上，要想把消费真正转化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动力，除了增加实际收入这一前提之外，再就是加快以消费信贷为核心的金融创新，以及财富效应的积累。这是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所充分证实的，也是促使消费快速增长的“催化剂”。